

酷儿理论与政治

痛之华——五零年代国共之间的变态政治 / 性想像

赵彦宁

壹·无限延迟的返乡

如众所知，1945年后国共内战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日趋炽热。今日仅由当时报纸的新闻报导¹，便可窥知自国共内战进入第三年的1948年中起，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民政府便崩溃似地丧失其在中国大陆的统辖领域。国共会谈虽于1945年八月的重庆在中日战争停止后迅即展开，但随着1946年三月国共于东北激战之后，军事武装的冲突便开始大规模进行；而当年七月在国民政府挟五十万大军对中共苏皖占领区进行总攻击、而毛泽东随之以「保卫战」为名宣布正式交战之后，全面内战便开始了。1947年中诸如南京、天津、北京等大都市居民对国府政经政策之不满主要尚经由学生日趋激烈的反内战、反饥饿示威传达²，但在1948年年底，距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过半年，人民解放军便已连串地「解放」了济南（九月二十四日）、长春（十月十九日）、徐州（十二月一日）、及中国古来北方的行政中心，北京（1949年一月一日）。蒋介石虽紧于其后（一月二十一日）引退，

¹ 见，如台湾史料编纂小组（1993）。

² 知名的「五二零惨案」便是在国府大力镇压学生示威的情况之下所造成的。

但此政治动作显然对挽回国府军事之颓势无明显助力。1949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总攻击令发动下，共军顺利渡过长江，并在其后一个月内占领了中国南方的两个首要都市，南京及上海。

虽然国府在首都沦陷后紧急迁往广州（以及其后的重庆），但显然不论对国府、抑或中共而言，中国「全面解放」的事实多少已被视为必然——莫论前者是否愿意接受、亦莫论此时刻究竟将于何时到来。但或许对中共领导者而言，如此迅捷的胜利亦令人惊异。毛泽东（1977）于1949年九月二十一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驰名的开幕致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这个情绪：「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了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而在国府这个快速的溃败过程中，台湾作为日后将近四十年「反共堡垒」的实质与象征位置亦逐渐形成：1948年南京国民大会通过提案，确定将建设台湾为「自治模范省」；1949年四月底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大批国府要员、家属、商贾纷纷搭机来台，蒋介石本人亦于五月二十六日飞抵高雄寿山，其「总裁办公厅」于一个多月之后便在台北草山设立；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十月一日建国，中华民国政府亦于十二月七日正式开始在台北办公，而在1950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以前所未有的沈重口吻声明「反攻到底」、且于二个月后复行视事之后，随着当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的展开与冷战的爆发，台湾作为一个本质无限延迟（forever-deferred）的反攻 / 返乡

行动准备地这个意义亦快速地被确立了。

台湾在如此一个政治的象征秩序中因而被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特性³，如前此所谓「无限延迟」的时间性（temporality）、永远震荡于随时欲发但亦随之收敛之间的行动警觉性⁴、及以一「弹丸之地」⁵涵盖所有「海内外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本岛、金马等军事基地、以及「海外侨胞」）的一种不断向外辐射的空间性（spatiality）⁶。笔者认为这些时间—空间（time-space）特质不仅相当程度地左右了五零年代国府在台湾重塑其国家权力机制的方式、亦影响了许多中国流亡人士对自我、现实、对过去的反思及未来的实践与想像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前引毛泽东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并合法化其国家机器组成的关键

³ 关于这些特性（包括前此所谓「无限延迟」这项时间性）、及其对某些流亡个人于五零年代对自我、台湾、与流亡的认识论形塑之影响，可见笔者稍早的研究论文（赵彦宁 1998a）。

⁴ 笔者认为这个警觉性并合着其他感知及认识论因素——特别为塑造一无时无刻均需被体察及搜索到的、但本质不具形色却又无所不在的「敌人」——在戒严时代的四十年中成为许多重要的认知系统的形成基础，其中包括所谓的「忧患意识」。

⁵ 「弹丸之地」顾名思义一在指其「幅员甚小」，二在借由「弹丸」内蕴的爆发力与杀伤力以合法化台湾做为「反攻基地」表面矛盾但实质必要的特殊性，即，此小格局的幅员之地正恰好成为「反攻弹丸」激励的唯一来源。

这个名词广见于五零年代官方与流亡者的叙事中，亦出现于笔者田野调查受访者的言谈里。此田野计画自 1998 年七月起正式开始进行，依附于笔者 1998-2000 年之二年国科会计画案下，受访者为 1949 年前后依随国府流亡来台的大陆人士，至本文写作时期（1998 年九月初）已有四十余人接受访谈。

⁶ 关于此向外辐射的空间性与中国近代以降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及汉人亲属价值系统之间的可能关系，可见赵彦宁（1998b）。

性会议)的开幕词中也指出了一项事实,即在当时的军事想像空间中,恐怕不论对中共、甚且对国府,台湾如同两广、新疆等地区一般不仅于军事行动上为一「边缘地带」(但因而迟早可被收编入毛于此文中所理解的「全中国」⁷),亦为一特殊的「文化异质」所在⁸。笔者认为台湾于此想像空间中并合着前述之时间—空间特质以及其被赋予的文化异质性,更加促发其作为中国流亡人士(不论国府人员抑或莫名所以随之播迁来台者)对今昔、他我的认同与想像基础。

贰·不断追悔中的感官经验

姑不论国民政府在大陆政权的崩溃是否源自其自我的结构崩解

⁷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毛泽东 1977) 这段话出现于前引文之前。

⁸ 对中共而言,台湾无法加入前者建国后所「不可避免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 1977: 6);对国府而言,台湾的「文化异质性」植基于其五十年的被日殖民经验中,但此异质性显然是可以(而且必须)被「矫正」的,而矫正之途则依循国府对「民族国家形成要素」的理解。故,陈仪在 1945 年八月二十九日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后即声明治台方针首重教授国语、国文,实行三民主义;当年十月底教育部便派魏建功赴台推行国语教育。

于此须强调的是,若台湾的文化异质性可经由教育途径而被矫正,则此思考之预设应为其「可被矫正性」必植基于其与国府来台人士共拥的民族国家特质。也就是说,正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台湾与「外省」的融合不仅是可预期的、亦是必要的。这个预设的同时标志(posit)了与「中国民族国家」对立(且必要存在)的异己,即所谓追随苏联共产国际、枉顾中华民族自尊的中共政权。此异己与「本我」互动的方式在五零年代的公领域中以数种方式出现,其中一种将是下文讨论的重点。

(如行政腐化、经济解体⁹、及蒋介石用兵失策¹⁰等等)，如前所述之国共战势的大逆转显然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的。于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的半年期间，国府已三迁行政处，终抵台北，这个流亡的过程且引发了众及二百万人由内地至台湾的大播迁，其规模及戏剧化的程度如某些学者所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黄仁宇 1991)。此流亡的突兀与不可预期性散见大部分受访者的言谈中¹¹，且往往以片段地感官性的修辞比喻(trope)凝聚于其回忆中，一段典型的叙事为：

那个时候我出来也很小啦，那时候是十几岁喔，好像出来是最后一步了，人心都惶惶的大部分都走光了啦，老百姓嘛我们是老百姓嘛，老百姓的村庄好像烧饭烧柴火啦烧稻草，稻草你懂吗？那时候老百姓都烧稻草烧麦子烧麦根啦还有蚕豆，蚕豆你晓得吗？蚕豆根蚕豆谷子蚕豆梗子烧啦烧啦烧啦就说来了来了来了[指共军]，那我们也不懂啦就赶快把火打熄了，就说[指父母对其说]军人逃难我们老百姓在家还是叫他们带我们出来嘛，就说跟我们出去吧你是女孩子嘛在家恐怖嘛，好像过去日本人没有人性的样子就是家里不好嘛就带我们出来，本来说带一下就回家结果就一直逃啊逃啊逃啊就逃到海南岛啦...我们也不懂啦，说是来了来了来了也没有看到什么。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受访者甲，原籍汉中。台中大鹏三村，1998年七月三日)

甲对流亡过程仅以押韵式不断重复的「逃啊逃啊逃啊」表达。

⁹ 仅由当代之回忆录便可窥知前二者，见，如柏杨(1996)。

¹⁰ 可见，如，黄仁宇(1991)。

¹¹ 本文所引述大部分的田野资料均由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三年级研究生、笔者国科会计画研究助理孙慧兰，于1998年六月至十月间经由口访取得。于此特别致谢。

突乎其来、且紧接时空不断流转的逃难过程难以提供甲可辨识、继而纳入记忆的符码系统，因而回忆凝聚于（始终未能体验与目睹的）「来了来了来了」之前的那一刻，而这一刻完全以片段的感官经验被甲理知：「烧啦烧啦烧啦」突然被「来了来了来了」的呼喊声打断，被打断的即为甲原先熟知的认知与分类系统（「烧稻草烧麦子烧麦根啦还有蚕豆」、以及「蚕豆根蚕豆谷子蚕豆梗子」），而这些认知与分类系统乃借由身体部位（body parts）作为可感知的媒介（如生柴火的手、与乍然听到「来了」的耳）——而既然是身体部位，这些感知便多为片段、破碎、甚且与语言系统隔离，甚且互相区隔的。对于许多当时随军来台的人士（不论被拉夫抑或志愿从军），流亡的回忆表面上以近乎机械式的地点串连呈现（如，「沈阳失守了，我们就退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从济南经过潍县到青岛，再到上海，然后从上海搭军舰来台湾在基隆登陆」），但这些地点仅提供回忆路线有如地图般的索引点（referential points），其记忆与追索的情绪仍相当程度地凝聚于感官及身体部位之上。受访者乙在家乡湖南省参军，1949年春自湖南行军来台，他说：

我出来的时候我是从湖南省 38 年的春天，经过福建广东。在福建省江西省走路的时候行军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有敌军追赶我们，我们一天几乎是走八十公里以上，从早上到晚上八十以上的路程。部队是白天走几乎晚上也在走，在这里我们唯一的状况就是闭着眼睛走。当时假如前面发生了状况，这个人啊无形之中也没有明讲就通通倒下去了，也没有口令叫我们卧下。这个时候我们在走路的中间，当然我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吃饭，我们跟敌人遇到了以后差不多四十八小时没有吃饭，到卧倒的时候这个人的全身都是软绵绵的，一点力都没有，好像这个好像就是说没有骨头的啦，起初二十四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不吃东西，

身体有感觉到非常难过的饿.....到了三十九年二月，那个时候淡水不够，我们在连上就用海水煮饭，事实上这个饭是不能吃的，不是咸，是苦，可是为了活下去就非吃不可，我们没有菜吃，可是没有淡水可是肚子饿又没有淡水怎么办哪，就用海水煮饭，有没有吃过那个饭？真是...真的是很难下口，那是苦的不说，咸的，而且是咸的带苦的.....至于说从汕头走到金门我们没有感觉到远...在这个中间...因为我们都是大陆人...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会晕厥的...因为大陆没有水喝的机会不多嘛...晕厥了以后就会吐嘛...吐苦水，那个吐苦水的味道我们是尝过的，就是肚子里头的东西吐到都洒出来，那个吐到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之苦的...那个难过的程度别人是没有的...从大陆上经过江西福建广东经过浙江到台湾到金门，金门下来以后我们就在哪里...金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增加这么多兵...那也不可能有菜吃，所以当时我们吃饭几乎没有青菜可以吃的，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吃今天这个什么鱼啊，就是最差的一种鱼啦，就是作肥料的...也没有什么米，它都是面粉...南方人吃面粉是不太喜欢的，尤其是广东人他最讨厌吃面，我是湖南省人，我们湖南人吃面吃的不多，米是主食面是点心，当时到金门之后早上中午晚上都是那个馒头...没有菜吃，就只吃那种鱼，那种鱼啊我们后来闻都不敢闻，吃到最后这个...没有菜吃，那个毛蛇线（？）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里头堤里头找到这种东西来吃...只是味道不怎么好...还有找那个地瓜叶，那个时候地瓜叶是没有人吃的....我是很幸运，从这个金门坐飞机坐到松山机场到台湾的。（受访人乙，台中沈智慧服务处，1998年七月二日）

填满（fill out）乙近乎机械式的（「从湖南省 38 年的春天，经过福建广东」、其次「从大陆上经过江西福建广东经过浙江到台湾到金门，金门下来以后我们就在哪里？」）叙事之间的，完全为其（有时近乎结巴地）感官性的、几乎踰越口语再现能力的片段的身体记

忆。这个记忆于大陆行军时以一种类似全面性的身体感知被乙所认知：「部队是白天走几乎晚上也在走，在这里我们唯一的状况就是闭着眼睛走」、「到卧倒的时候这个人的全身都是软绵绵的，一点力都没有，好像这个好像就是说没有骨头的啦」、「晕厥了以后就会吐嘛...吐苦水，那个吐苦水的味道我们是尝过的」、以及「身体有感觉到非常难过的饿」等；于金门时则凝聚于「吃」的感官过程：「差不多半年时间就吃今天这个什么鱼啊，就是最差的一种鱼啦，就是作肥料的」、「也没有什么米，它都是面粉...南方人吃面粉是不太喜欢的，尤其是广东人他最讨厌吃面」、「那个毛蛇线...我们那个山里头堤里头找到这种东西来吃...只是味道不怎么好...」。感官性的感受能力于流亡过程中竟成为他 / 我的重要分类标准之一：于大陆行军时全面性的身体感受可借以分类「我们」与「他们」，而此处的「我们」表面上指「大陆人」，但其实指「以我们这种饥饿的方式来到台湾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大陆人...那个难过的程度别人是没有的」）；而仅就面食的感受而言，乙可（想像性的）再度确立众流亡者建立于大陆家乡、但难将于台湾全面重塑的省级分野（「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我们」）。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大陆溃守所导致的流亡经历，不仅凸显了台湾于「无限延迟」的反攻过程中作为一特殊的时—空想像（及认知）起点之重要性，且于此想像过程中亦同时生产、且合理化了个人于流亡前、及流亡中对人事物的分类架构。笔者认为，往往并随以上象征形成与合理化过程而生的，亦为个人追索及反思过往的强烈欲望。如此之欲望可以多种方式呈现，且通常伴随着强烈的主观情绪。对不少流亡者而言，其呈现的情绪集中于一「重要之物」上，而此

物为一「丧失之物」(lost object)。与 Freud (1963 [1929]) 的恋物 (fetish) 相同，这些物对主体的价值必须透过「事后重塑」(retrospective reconstruction) 的方式形成，且主体以近似偏执的方式不断在想像层面上意图逼近此丧失之物；而与 Freud 的论点相异的，为主体对此恋物的关系多少决定于恋物尚未成为恋物前主体与物的感官关系之上¹²。如受访者丙所言：

在一些年轻的孩子或是学生像我先生来说，因为大陆很大教育不是那么普及，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学校，一般到了这个时候〔指 49 年前后中央政府撤退来台之时〕学校整个撤退了嘛，说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到台湾去，到台湾干嘛，台湾是个小岛对不对，但是他们不了解，那个时候说台湾是个蓬莱仙岛，认为台湾就是个蓬莱仙岛去玩玩也好，去玩玩几个月就回来，所以甚至身上都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先生身上穿了一套衣服就这样就来了，到了基隆太热了，我先生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换香蕉吃。妈妈手织的毛衣。后来就一直想好后悔喔，自己唯一的纪念品结果把它拿来换香蕉吃。因为在想我过几天就回去了，但香蕉没吃过。(受访者丙¹³，台北国军英雄馆，98 年 8 月 5 日)

¹² 在 Freud 的论述中，小男孩未曾真正触及将来用以「掩盖」(cover up)「空无」的母亲肢体(或母亲性器官的转喻〔metonymic〕延伸，如内衣裤等)。这也就是为何恋物形成的那一刻它永远仅以影像的方式为小男孩主体所认知的原因。

¹³ 于前引文中表面只描述丈夫撤退来台心路历程的甲，本人于 50 年中秋节晚随同家中女性长辈(包括外婆与母亲)由当时已「沦陷」的福建搭船，经由马祖来台。当时甲六岁。逃难当天为中秋节、及其由「沦陷区」而来这个事实显然对其印象深刻。甲的丈夫来台时尚未满十二岁，来台初期加入军中康乐队。

「后来就一直想好后悔喔」。对丙所目睹的丈夫（且极可能包括丙自己），确定其与台湾此无限延迟的返乡时—空间互为主体关系之后迅即而生的，便为如前所述几近不可抑制的回忆 / 反思活动（「后来就一直想」）；这个认知的过程凝聚于一已失（且几乎确定永不可复）的恋物之上，而这个恋物（于此例中为母亲手织的毛衣）不仅体现（**embody**）了个人的情感，更成为个人思索自我、回忆过去、且兴起可被他人理知的情绪（即，「好后悔喔」）的生产中心（**production loci**）。此类感情凝聚 / 生产之物对流亡主体的形塑同时扮演另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非逻辑性的联结（**conflate**）「流亡前」、「流亡中」、与「流亡后」三个时—空片段中个人所习用的象征秩序（故包括稍早提及的分类原则）。在丙夫妻的例子中，「无复可寻之物」原先为母亲手织之毛衣，其所勾联个人「流亡前」的象征与分类秩序由母—子延伸开来的汉人亲属体系结构所代表；「流亡中」的时—空阶段令丙的丈夫于莫名其妙、所谓无意的状况中丧失此物（「我先生身上穿了一套衣服就这样就来了，到了基隆太热了，我先生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换香蕉吃」）。但这原先不可想像、无可预知的流亡地情态（「到了基隆太热了」）在表面上毁坏「流亡前」分类系统之余、竟亦生产了一全新的主体情感（**affection**）形成基础（即，无穷的悔恨、不可自抑的追忆、与近乎甜蜜地对恋物的追怀）；而于此一种全新的情感产生的过程中，事后将被不断记忆之物乃借由一特殊的交换活动而丧失（即在物质的层面上被彻底的取代），进入此交换活动的「他物」为许多受访者均会提及的「香蕉」。香蕉这个前所未见之物的出现，不但标志了主体将进入一全新的象征交换体系，且借着「食」的感官经验将主体带往终将无限悔恨的情感界域。被交换掉的不仅为「毛衣」，亦为生产此毛衣者（母亲）所象征的亲属机制。在可以肉体关系亲

炙的亲属体制被替换的同时，「食用香蕉」的感官经验亦宣示了「台湾经验」（半带暴力性地）的到来¹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原先无可预期的交换活动通常不但为一种几乎不可解释的交换欲望所驱动，「食用香蕉」这个崭新的感官体验本身往往又启动（initiate）了一前此无有的耽溺的、甚且是纵欲的「解放」经验。前引的受访者乙紧接着前述于大陆行军与在金門受饿的回忆后，开始叙述他对台湾生活的不习惯，但在这「不习惯」中，香蕉象征了对无限延迟时一空忍耐的突破及抗拒。他说：

我们看到台湾的景象，在我的感觉啊很凄凉很落后很荒凉¹⁵，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看到的房子啊

¹⁴ 于此，值得引述的是受访者丁的一段回忆。于 1948 年于湖北家乡被政府军拉夫后来台，与许多类似背景的流亡者相同，丁的流亡与台湾经验有如短促间被迫现代化的经验。「香蕉」则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之前没听过台湾嘛...到海上的时候才听到...在新竹湖口下船...哎呀那个时候在老虎口很苦啦...我现在讲个笑话不要笑啊，我们在来的一段路穿的那个老百姓的衣服，到台湾衣服就不能穿，就跟那个老百姓啦...那个老百姓穿那个拖鞋、木头的、扣扣扣，戴一个草帽穿一个裙子在卖什么，在卖香蕉啦，我讲一个笑话啊，在大陆我不晓得什么叫香蕉啦，结果我就那个裤子没有用嘛，她要穿，她就给我那个香蕉。那个香蕉，很好看，黄黄的。我拿着就吸都不会吸开，这样吃啊吃啊怎么好难吃啊。那个小姐就笑，香蕉要剥皮的，我不懂什么叫剥皮。这个真是（笑）...我们家乡没有香蕉啦。听的说是香蕉一定很香啦不说要剥皮嘛...我不知道香蕉要剥皮啦...那是第一次...那个卖香蕉的笑死了...（1998 年 6 月 27 日，丁台中寓中）

¹⁵ 必须要强调的是，固然至目前为止多数受访者对台湾的「第一经验」（first encounter）颇为负面，但所有源自中国乡村者却认为 1949 年的台湾远较其家乡富裕进化。受访者己（1998 年 9 月 9 日，台北寓中）于 1949 年初自家乡山东高密逃难至青岛，后从军来台，由于自小为「庄稼人」，他对台湾当时的理解便多由对农村的观察为起始，他这方面的判断基础为「当时看到台湾农人骑脚踏车去田里工作、田中有灌溉沟渠、田里极干净...我们家乡脏乱的很」。

非常之矮非常之小，而且那个窗子最小，我们湖南省的房子都是木头盖的，至少有两层楼，窗户大大的...我跟部队来到以后对于这个香蕉感到很奇怪。这个水果吃起来真是蛮好吃的。我就一直吃香蕉，就把肚子吃坏了，因为这个水果我觉得满稀奇的，我们湖南省没有嘛，味道口感又蛮好，我连饭都不吃，结果把肚子吃坏了，拉痢，在军队拉痢是不行的啊！

至此我们可见奇异的时—空、将行未行之行动、流亡中乍兴的感官经验、对过去情感性地自我再现方式、以及一肉体不复抑制的「食用 / 占有」（consume）欲望彼此间互相形成（mutually constitutive）的建构机制，而此互动之机制又与一对主体参与过去及未来的想像丝丝相关。在下一节，笔者将进一步申论前述象征与情感建构的基础，对于某些五零年代的文人对过去——特别为国 / 共对峙形成的起因——会引发何种深关身体、以及性的理解或想像。

参·无尽止的怀念——恋物的共匪，怪胎的情感

对不少五零年代文人言，其对当时在台湾个人主体建构的理解奠基于—前此（即在大陆之时）「主观个人」与「客观历史」间相互辩证的关系上。如，原籍山东，后任军职，曾任新闻局主任秘书的张腾蛟于其早期（1968）的作品中直书其主体形成、与其所理解之历史性之间互相辩证的关系，这个关系对张的重要性聚集于他使用「文字」这个再现体系的方式：

投生在这个战乱的年代里，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受教育，两年小学与一年半的初中，仅仅能使我不再「文盲」而已，用这一点点本钱去从事写作，显然是过于单薄与脆弱。所好的是，战乱虽

然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它也给了我某种程度的智慧与毅力，使我懂得如何去自我教育；如何去充实那些流浪的日子。

试着写作，是从二十岁的那年开始〔注：即为1950年，张随军来台的下一年〕，在一种狂热的情绪支持下，我曾经在「诗」的身上投下了十年的岁月，直到四十九年我的「海外诗抄」出版后，对于诗的热劲才慢慢消失，自那以后，我已深深的体会到，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诗来表达的，于是，我试着选择了新的路子。

我常认为，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对于他的作品，应该赋予两种使命；一是艺术的；一是时代的，而且，在两者的比重上，不该有过多的偏差。我也常常认为，一个文艺创作者，对于时代和社会，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因此，落墨之先，就要考虑倒是何为而写与为谁而写的问题，也就是要考虑倒；你将要给予这个社会的，是一些什么？将要给予读者的，又是些什么？我这个薄薄的集子，就是怀着这种警惕下笔的。（张腾蛟 1968：1；黑体处由笔者所加）

对张及当时许多文人（特别是与张境遇类似的「军中作家」与「流亡学生」）而言，战乱与流亡不断变迁的过程取代了正统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如张所言「充实」自我的论述场域。于此场域中，一种类似「狂热」的情感被生产了，非得以某种特殊的再现形式予以抒发、激扬、抑或掩盖不可¹⁶。笔者认为，隐含此情感运作模式之后

¹⁶ 对张而言，此再现形式为「诗」的书写；原因就其所言为诗远较其他书写形式「精练」；而在历经十年诗的创作后自觉无法再有理念的创新，便转向据其所言与诗的精练度类似、但理念阐释更清晰的散文。相关对诗、散文、小说间叙事形态与书写主体创构性、抽象思维之形塑方式、及真实一再现实关系的看法广见五六零年代此类文人；至于为何书写叙事对其内韵前述的价值与分类标准，当然是一个值得探究与分析的课题。

的，为一特殊的对真实—书写自我—再现间关系的认知与实践，透过此认知—实践的创构过程，主体性得以形成，而以辩证关系进入主体形成过程的「它物」亦得以被建构、且被赋予价值及意义。以《旋风》(1957[1959])及《重阳》(1961)等「反共文学」被夏志清(1979)喻为「五四文学传承者」、并获得1978年第一届吴三连文艺奖的姜贵(1957[1959]: 1-2)，于来台后第一本小说著作《旋风》的自序中，将前述主体、感官、物、及记忆之间的关系对其之意义阐释地颇清楚；有趣的是，在此，这具转变书写主体情感创构能力（故亦激发一崭新的叙事方式）之「它物」竟是1949年10月后于台湾通称的「共匪」：

三十年来，我写过五个长篇小说。二十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个，那是一个畸形恋爱的悲剧故事。〔下略〕第二个也写的是一个恋爱故事，〔下略〕这一篇，题名为「白棺」。

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那一套以后，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记忆历数年而犹新。二十年，我写了我的第三个长篇「黑之面」。我以为共产党是属于「光明的反面」的东西，必无前途可言。〔下略〕

张的解释出于1998年9月初于台北张寓中的访谈，亦见于其于某散文自选集的「自序」（1989）：

我之迷嗜散文的创作，是因为它能容许我在它的身上实验一些创作的理念和技巧，像是适度的夸张、有限度的抽象、技巧性的含蓄，以及象征手法和想像力的运用等等。当然，它还在文字魅力与音乐性的发挥上，给了我足够的弹性和空间，让文字们有一个飞跃跳动的机会。

文字为何可脱离书写主体进行「飞跃跳动」的活动，显然为一值得分析的主体—物的互相创构现象，但囿于本文篇幅之限制便不再多谈。

三十七年冬，避赤祸来台，所业寻败，而老妻又病废，我的生活顿限于有生以来最为无聊的景况。回忆过去种种，都如一梦。而其中最大一个创伤，却是许多人同样遭遇的那「国破家亡」的况味。由于三十年来所亲见亲闻的若干事实，我想我应该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我将我整串的回忆，加以剪裁和穿插，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即于每晨四时起身，写两三个钟点，四个月内从无一日间断，我的第五个长篇，便于四十一年岁首草草完成了。

这「有生以来最为无聊的景况」的形成与其所涉及的情感状况十分有趣。表面视之，这个「无聊」指的是「无事可为」的情境，造成此情境的起源为「赤祸」、及随「避赤祸」而生的失业与疾病；但这「无聊」初激发姜回忆的活动，复并合着回忆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情感模式（如「都如一梦」暗喻的似真若幻、真假莫辨等或怅然、或焦虑的情绪、及随之再度¹⁷体受的「创伤」）而成为书写主体创构的原动力，使得姜以持续的、几近偏执的、耽溺的身体展演活动（「即于每晨四时起身，写两三个钟点，四个月内从无一日间断」）完成了《旋风》。更重要的是，《旋风》的书写正源于一强大的消弭前述似真若幻、真假莫辨情绪的欲望，而所谓的真假莫辨指的应为一对真实与再现界分不再的主体经验。有趣的是，对姜而言，唯有透过书写再一次肯定「回忆中的过去」（即「个人曾体验的共产党真相」）作为现存此刻唯一至上的价值评量标准与形塑本始（ontology），真实与再现的必要分野方可维持，个人的生命才再具意义。简言之，唯有透过确立共产党的「真相」，当下的「真实」方有意义、才能

¹⁷ 曰「再度」因姜当然早已历经「国破家亡」的「创伤」，但经此「无聊」，这「创伤」再一次地、且更加深刻地为其体受。亦即，「再次」的经验、事后的回溯于此具验证且真实化主观体验的能力。

存在；而唯有如此，主体的时间（以「回忆」为代表性活动）方能与「客观的历史」勾联起来。姜（1961）紧随《旋风》后写竣的《重阳》〈自序〉中重申此写作意图，并在正文中进一步将这个「本始」凝缩至宁汉分裂、国共分家之前的一小段时间中。国府的正统历史终于清楚地「印证」了姜的书写主体；姜对「过去」「创伤」式的回忆终于可与「历史」达成想像的融合，而此想像的心智活动不仅为其所承认，且被其视为一必要的活化（activate）当下真实—再现区隔（故进一步激发有效、有意义实践〔praxis〕）的革命行动：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惟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发表其共同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份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产份子所把持。各军之间，更饱受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合。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党部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

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这一节书，小标题是「武汉左派的悲剧」。

现在，「重阳」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悲剧」。
(页 3)

历史小说并不就是历史，「重阳」的故事完全出于虚构。因此，如果以书中之人之事，证诸当时之实人实事，以求其所以影射，那就完全落空。

我的目的旨在重现那一时代的那一种特异的气氛，给人重新感受，重新体会，用以「纪恶为戒」而已。或有人以为这个想法有近冬烘，而且为时已晚，我却不那样悲观。胡适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话。

同时我也一直相信，共产党一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必须敢于分析它所由产生的那些因素，然后才能希望有办法把它扑灭。诅咒与谩骂也许能泄愤称快于一时，实则并无多大用处。至于「讳疾忌医」，其危害之烈，更不必说了。

反共，需要冷静，也需要智慧。(页 5)

依其所信，有效且有意义的实践只有一种，便是「反共」；此实践的效力与意义来源则为在「冷静」的心态下、以「智慧」来「分析」共党坐大之因；而遂行此批判性活动的途径之一则在借助书写「想像性」的过去，却吊诡地「完全再现」「真实」——所谓「完全再现」指的便是一（暴力地）突破再现—真实疆界的象征行动。第二重吊诡之处在于，书写主体又如何能同时以书写的再现形式重现真实、且又维护稍早所提及日常生活中对姜而言再现—真实的必要二分呢？笔者认为，在姜如此的情况之下，几乎唯一的出路便在试图借由书写联系这「它物」与「情感」—「感官」。如前几节所引受访者历经五十年更胜的回忆，流亡之后新生的「价值」须透过

一崭新的感官经验方可被主体认同，而此经验却又与一「丧失之物」相关；但在崭新的情感—感官经验乍兴的过程中，另一全新的「它物」也同时被创构。对前引许多受访者言，这「它物」或是「香蕉」、「感官」或是「饥饿」（及与之相对的「无可抑制的饱足」）；对于姜言，「国府左派」与「共产党」（即「我」、「它」）的交接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的情感—感官经验（即「真实」至上的判断标的）却以柳少樵及洪桐业二位男性之间的情欲争斗与互动来表达。国际共产组织于意识形态及革命行动上无可抵御的感染性魅力，于此书中被理解为能于同时间进行的多元言说行动网络中展演、并操弄论述异己主体位置之能力。书中中共的代言人柳少樵完全征服对方的方式为直接肉体的 S/M 男男性交，而进行的方式为给予洪一个「爱的教育」，这个「教育」始于论述「爱」的真谛，终于「爱」的实践；论述与实践并行，旨在阐述「真爱」必奠基于言说与肉体双向的绝对主从关系；即，此为一单向的、非交换的施予行为，真正的爱人仅为施虐者，受者不仅最初无法了解、且终究仅能模模糊糊地揣摩，并永远无法复制此权力 / 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另一施虐者¹⁸。更重要的是，这个爱与被爱的关系也验证并体现了生命的精髓——故当小说结尾洪桐叶试图脱离与柳的关系时，也正是其死亡之契机；而结束其生命者，正是柳本人。柳洪初试男男 S/M 情的这段文本值得全部引述：

柳少樵扔掉那香烟蒂，站起来，抱住洪桐叶，在他的腮上嘴上连连亲着。然后推开他，说：

¹⁸ 小说中柳在「食髓知味」后，曾数次欲复制此权力关系于其他人身上，特别为他的妹妹洪金铃。但连他自己亦诧异为何柳对其的控制如此成功、而他自己却完全失败。简言之，真正的 S/M 关系仅能由真正的施虐者启动，且一旦受虐者的主体位置确定，便永无改变的可能。

「我们常常教训我们所爱的人。凡受我们教训的，一定是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把我们不爱的任何人，都看得像垃圾，不值一顾，他们不配接受我们的教训。你明白吗？」

「明白。」

「你愿意吗？」

「愿意。」[下略]

柳少樵嘴上笑笑，又问：「看见你腰上的刀吗？」洪桐叶点点头。

「说呀，看见吗？」

「看见了。」

「它利不利？」

「利。」

「整把刀子插到你的腰里去，不费事吧？」

「不费事。」（下略）

彭文学把刀递给柳少樵，铺好油布，教洪桐叶立在油布中间，从柳少樵手里接过刀来，立在洪桐叶身后，刀尖从洪桐叶的背后对准他的心脏部位。一边说：

「兔儿，今天有你受的！」

柳少樵瞪他一眼，蓦地立起身，一言不发，就动手了。

.....

一时，事毕。彭文学放下屠刀，把滑到鼻尖上的近视眼镜推了上去，抹抹嘴上的汗，扶洪桐叶到柳少樵的床上将习。[下略]

柳少樵坐在床边上，俯身下去在洪桐叶的脸上吻着，

用又短又硬的胡子在他的腮上摩擦，擦得洪桐叶又痛又痒，推他，他就俯得更紧，一迳并排做了下来。

「小洪，记住，我是爱你的。一切，一切，都由我爱你而起。」

柳少樵亲昵的说：「我永远见不得你背离我。一旦被发觉了你背离我，我就取你的性命。即使取你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你今天已经上了第一课，应该明白了吧？」（页 93-94）

洪桐叶受「教训 / 教育」之表面原因在其「背信」于柳，在关键时刻未放弃其为法国买办服务的工作。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在为买办服务的其它中国工作人员邀请他去嫖罗宋妓女。为罗宋性交易者的女色而背离柳的指示，对柳而言显然较单纯的「违抗组织」更不能容忍，因此采取男男 S/M 的方式「教导」洪何谓「真正的爱」。但究其实，洪自为法国籍女主人修脚、因而酝酿对白种女性身体部位之情欲，至与罗宋妓女——亡国之「白俄女子」对中国被殖民男性的情欲想像空间中显然占有特殊的地位——进行买卖式性交，终至自愿式的成为柳的性奴隶（二人间这方面的情欲互动于此后仍不断被描摹），其情欲 / 权力的建构过程显然绝非仅涉及男 / 女、异性 / 同性之面向，尚应包括殖民 / 被殖民与国族 / 亡国的象征转换层面，而这个层面应该与「国际共产」 / 反国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相关。《重阳》中将国共斗争以如此的暴力性情欲关系描摹是相当值得进一步分析的，但囿于篇幅，本文仅再引述张买办带领洪嫖妓完后的一段心态描述，以彰显前述情欲、权力、被 / 殖民、及国家之间的关系：

「[前略]小洪，你喜欢看电影吗？」

「很少看。」

「范朋克总看过的，你喜欢他吗？听说他在月宫宝盒

里边把一个拖辫子的中国人当狗熊耍，一定好玩的很，好戏不可不看。」（下略）

白俄男人见缠了半天，没有缠到一点生意，涨红了脖子，掙着毯子一气走了。嘴里嘟唧着，大约说的是俄语，也大约是骂人的话。

「亡国的人也真可怜，」张买办说，「男的卖毯子，领港，女的卖淫。」

「只怪他们从前享福太过了。」洪桐叶说。

旅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一个穿红裙的英国军官，正挂着一个广东咸水妹悠然走过。那个咸水妹细细高高，黑黄皮肤，画着细长的眉，赤足穿着高跟鞋，有着一种浓郁的南国情调。洪桐叶心里一动，觉得这和罗宋女人的肥白，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而实在各有千秋。（页 48-49）

先透过直接的肉体接触（即性交），继而借由视觉的感官媒介，洪展开辨识国族差异性的能力，微妙的是，这个对其日后共产党员身分认同极具关键性的差异性最初竟须借由（表面性化的）女性这个媒介方能展现。小说中段起，柳为求训练洪「真正的爱」的能力，不断要求后者以汉人性 / 别及家庭意识形态之标准而言甚为极端之方式「奉献」其寡母及幼妹，如，诱二人卖淫。正统亲属结构不仅在国民政府论述系统中为标识其文化及政权正统性的最终指标，并可用来标识所谓无正统性的「匪伪政权」，对流亡者而言，亦是检验其飘渺的主体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点在上一节对受访者丙的丈夫无限恋慕母亲手织毛衣的分析中已可窥见端倪。而对冷战时期不分中外的《重阳》读者而言，其之所以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反共小说」，也正因洪「泯灭人性」「出卖母妹」的描述（见，如，Ross 1974）。

那么，洪桐叶究竟为何心甘情愿地进入这个全面性的 S/M 关系、又为何虽数度犹疑自怜但终其身仍无法脱离柳少樵的摆布，直至死而后已？换一个角度，究竟为何姜贵选择如此一个「变态」¹⁹的情欲主题以「纪恶为戒」？罪恶为何、须警戒的又当为何？或许更重要的问题为，为何需要如此不懈地、重复地铺陈这个变态情欲主题呢、这般的书写形式又形塑了什么样的快感？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重阳》中明白地交代洪在此关系中得到无比的快感——一种无可言说、姜贵亦未曾解释的耽溺的快感——虽然这快感之兴起完全突然、无可预期；也就是说，不知何故在第一次「教训 / 教育」之时，洪便即时产生对此权力 / 肉体关系的莫大依恋与依赖。正因此依恋—依赖无可预期及无可解释（因此暴力地踰越了书写、甚且任何再现机制捕捉真实的能力），方可被姜贵运用以（吊诡地）再现中国共产党对「正常人」（即于正统亲属体制中建立性 / 别主体性的「中国人」）壮沛莫之能御的控制权力。而这也就是为何姜于《重阳》〈自序〉中申论「诅咒」与「谩骂」无济反共的原因：类似诅咒与谩骂「世俗的」——即可以迅即、现世的论述活动抒发不可解之情绪的一言说行动，对于本质超越象征体系规范的「真实」（共匪本质）又能奈之如何呢？

这个对「真实」的体验并不难以了解、且可见诸五零年代许多流亡作家之笔间，对此笔者之前亦曾试图阐述（赵彦宁 1998a）；但笔者认为更有趣的应为本文之前所欲分析的于无限延伸的流亡过程

¹⁹ 这个主题是如此的「变态」，以致就笔者粗浅的观察，没有什么文学批评界的研究者愿意、或胆敢提及——虽然这是极奇异的，因为姜贵在全书近六百页的篇幅中最加着墨的，正是柳洪这个「变态」的关系。

中所生的情感—感官体受、及其与回忆、真实与再现间的多重形塑关系。笔者认为，在这永须于**事后**重塑过去（并借此定义当下）的反思批判活动中，如前所述地，一几近耽溺的贪恋情感产生了，对姜而言，**真实地**体受这情感的感官与身体展演方式不仅在近乎偏执的、日复一日的书写活动、更在于书写所谓变态情欲间**再度**确立此耽溺情感的感官性。于此，再现不仅与真实融合，再现（并是想像）的感官方能超越、甚且取代情感，成为流亡主体建构的必要机制。笔者并认为如此的变态（或怪胎）情欲并不涉及既存社会结构中的性 / 别认同。正因二者的不干涉性，「变态」之情欲方可超越现世的性 / 别指涉系统（referential system），成为**真正的**变态。最后，笔者将引述姜贵于《重阳》〈自序〉中紧接前引「光明」、「黑暗」关系之文以作本文小结：

而「黑之面」到底写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两年前，偶步街头，看见一家叫做「华的工艺社」的市招，才联想起「黑之面」的女主角名叫「华的」。「华的」是女人的一种面饰，我们有时在西洋女人的帽子上看见插一根羽毛，现在妇人勒发也有用与其发色配合的羽毛的，「华的」大约就是那类的东西。往古男子出猎，获得珍禽异兽，归而以其羽或皮献其所欢，用以示爱。妇人以羽为饰，起源大抵如此，这就是所谓「华的」。「黑之面」写些什么，看了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也大致可以想像了。（页 1；黑体处由笔者所加）

後記：若非以下人士於本文寫作過程中的參與及協助，此文必無法完成，故於此一併致謝：筆者三位東海大學碩士班三年級研究生兼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孫慧蘭、吳復華、與曾薰慧不僅直接參與筆者目前之研究、且時時提供可貴的資料與見解。就本文寫作言，筆者特別感謝孫慧蘭自 1998 年六月底至九月中的田野與口述歷史調查、吳復華就台灣戰後政經大事的資料蒐集、與曾薰慧就

五零與六零年代公領域中有關「匪諜」敘事的查證。此外，筆者亦感謝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丁乃非與何春蕤力促此文之完成、且企劃本文的中文標題，其間丁教授且擬定本文之英文標題，何教授並撥冗與筆者探討性 / 別政治、階級、與今日台灣社會結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筆者亦感謝蔡柏貞於文字潤飾與勘誤方面的協助。

引用书目

- 毛泽东，1977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3-7。
- 台湾史料编纂小组，1993 《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 I (1945-1965)》。台北：业强出版社。
- 柏杨，1996 《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社。
- 姜贵，1957[1959] <自序>，《旋风》。台南：明华书局，页 1-3。
- ，1961 《重阳》。台北：作品出版社。
- 夏志清原著，刘绍铭等译，1979 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
- 黄仁宇，1991 《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
- 张腾蛟，1968 <序>，《菩萨船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1989 <自序>，《溪头的竹子·中国文选系列 6》。台北：文经出版社。
- 赵彦宁，1998a <流放的政权与流亡的身体——论五零年代公领域中的主体、物、与性 / 别>，《第三届性教育·性学·性别暨同性恋研究研讨会》，中央大学英文系性/别研究室。4月15日。
- ，1998b <试论父系历史空间性中怪胎情欲化的可能>。《性别与空间研究室通讯》，第五期。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页 197-209。

Freud, S.,1963[1929] “Fetishism.” In P. Reiff (ed.), *Sexua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York: Macmillan.

Ross, T.着，陈森译，1974 〈论姜贵小说的主题〉。《书评书目》，14期。